

“中国模式”话语奠基的尝试

陶绍兴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2)

摘要: 历经认识论转向后,“中国模式”现在又开始了语言转向。欲通过精炼的词语传达复杂的内容,最好能想一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短语。新自由主义的独白、西方左翼学派的哑然昭示着中国学派话语体系的应然出场。为“中国模式”话语奠基,进而向世界发出“中国好声音”,中国学界责无旁贷。中国学界应在厘清“中国模式”的话语逻辑基础上,坚持循序渐进,把握“中国模式”的话语节奏;坚持理论自觉,夯实“中国模式”的话语根基;增强理论自信,提升“中国模式”的话语能量;实现理论自强,建构“中国模式”的话语体系。

关键词: 话语;话语权;“中国模式”;立言;奠基

中图分类号: D 03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3)06-0012-09

The Effort to Establish a Discourse of “China model”

TAO Shao-xing

(Anhui Business College, Wuhu 241002,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cognitive turning, now “China model” is setting out to its new turn linguistically, which is to convey the complex content by using concise words and impressive phrases to the world. The monologue of Neoliberalism and the dumbness of western leftist school indicate the indispensability that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Chinese school comes up on the stage. Thereby it is crucial that having established a discourse of “China model” Chinese theory circle should then emit “the Voice of China” to the world. , Based on the foundation of clarifying the “China model” discourse logically, Chinese academic circle should grasp the rhythm of the “China model” step by step, strengthen the foundation of “China model” discourse by adhering to the theory of consciousness, enhance the discourse power of “China model” by reinforcing the self-confidence in theory, and construct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China model” by achieving self-improvement in theory.

Key words: discourse; discourse power; “China model”; speaking; establishment

一、话语期待:“中国模式”的语言转向

马克思指出,“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

一切个人的时代的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关于“中国模式”的问题,依次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问题是“中国模式”存在吗;第二个阶段的问题是如何认识和总结“中国模式”;第三个阶段的问

收稿日期:2013-10-25

作者简介:陶绍兴(1976-),男,安徽芜湖人,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政治部讲师,哲学硕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题是如何用语言表述“中国模式”。“中国模式”以浓缩的形式表征了哲学史的两次转向：一是本体论的“中国模式”转向认识论的“中国模式”，二是认识论的“中国模式”的语言转向。

从中国大历史中探骊得珠，不难得出，“中国模式”是一个历史的实存，亦即本体论的“中国模式”的客观存在。她最早滥觞于鸦片战争时期，“中国模式的说法虽然新颖，但其诉求却由来已久，从中国迈步走向现代的那一刻开始，就从没有放弃过对独特社会模式的诉求。不论是洋务运动所追求的中体西用，还是孙中山试图超越资本主义模式的三民主义，都无一例外地表现出了追求中国特色发展模式的自觉诉求”^[2]。中国崛起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了本体论的“中国模式”的客观存在。今天看到的，不管是普京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或是拉丁美洲正在兴起的一种摆脱美国霸权宰制的结构，甚至法国总统强调要迈向多极的世界体系，其实后面都有中国崛起的影子，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战略格局，才有那些可能^[3]。伴随着中国崛起，国内外关于“中国模式”的学术探讨才浮出水面。

事实的财富必然会转化为思想的财富，亦即本体论的“中国模式”必然会转化为认识论的“中国模式”——中国崛起之道的理论总结。中国崛起所内蕴的“中国奇迹”世所罕见、史所罕见。“中国奇迹”之迷引发了全球热议。正是“中国奇迹”的理论追问促成了崭露认识论的“中国模式”的机缘。中国崛起不但深刻地改变了中国，改变了整个世界，也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对中国和世界的看法。中国崛起是西方世界特别感兴趣的事，国际传媒巨头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曾经慨叹，“一份报纸希望在全球畅销最快捷的办法，就是把中国放在头版”^[4]。如何“认识中国”，建构认识论的“中国模式”成了21世纪的难题。“西方的‘国际社会’拥有人口的10%，而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0%以上。比起西方的进步，中国的进步更代表世界的进步。中华民族六十年两代人的辛勤努力创造了强大和富裕的

神话，也改变了世界格局，使我们有可能重新审视时下流行的关于人类进步的知识”^[3]。

欲通过精炼的词语传达复杂的内容，最好能想一个给人留下印象深刻的短语。历经认识论转向后，“中国模式”现在又开始了语言转向。借助语言转向，植根于中国实践的“中国模式”话语体系方能够生长、生成并完善起来。“中国模式”是一种世界性的思想现象。“中国模式”在国际上引起热议，本身就显示了其价值。“既然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在争议中国模式，如果我们能抓住机会，对‘中国模式’这一概念进行明晰化、条理化的阐释和解读，用‘世界流行的时尚语汇’把中国是什么样的国家，在走什么路，未来将走向何方等讲清楚，那么，对内，可以统一意志，明确方向；对外，可以占领话语制高点，改变国家形象，增强软实力”^[5]。

二、独白、哑然、对话：呼之欲出的中国话语

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对立与融合，突出表现在话语权的方面。显然，如果不建构出一种合适的话语框架，将很难解释清楚“中国模式”。新自由主义的独白、西方左翼的哑然昭示着中国学派话语体系的应然出场。

1. 独白：新自由主义的傲慢

苏联解体^①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低潮，新自由主义模式似乎成了人类惟一的出路。“华盛顿共识”以咄咄逼人之态傲视全球，操控着整个世界话语霸权，并竭力向欧美以外的国家兜售。东欧国家照单全收，引来了颜色革命、经济动荡不已；拉丁美洲国家照单全收，使其陷入债务危机；亚洲国家照单全收，引爆了亚洲金融危机。现在，尽管美国正在走出金融危机。但能否完全走出危机阴霾仍有待观察。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倒是没有采纳“华盛顿共识”的中国（一些学者罔顾事实，竟然将中国

^①话语体系颠覆之殇成了苏联解体的前车之鉴。苏联解体不是由于经济与军事力量的落后。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的知识界首先被西方新自由话语征服，直至其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也被新自由主义话语所套牢，新自由主义话语渗透、占领了整个苏联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当中。

的成功归之于“华盛顿共识”),呈现的却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正在形成的一种独创性的“中国模式”吸引了全球的目光。“中国黄祸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和“中国不确定论”等各种预测层出不穷。西方在对中国做出各种各样的预测破产之后,“听听中国怎么说”成了他们无奈的选择。西方国家感叹中国正在崛起,而他们自己的模式已陷入危机。新自由主义话语是否穷途末路尚待观察,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它基本上已经穷尽了话语活力。“在现有理论失去了解释力后,他们只能用‘中国奇迹’、‘中国之谜’对中国的实践进行叙说。‘中国模式是一个新故事’。这个‘新故事’需要用新的话语去讲述、新的理论去诠释、新的思维去续写、新的视野去概括”^[6]。“必须首先要找到一个适合于中国本身的话语,简单地使用从西方发展起来的国际关系话语往往使人误入歧途”^[7]。尽管“历史的终结”已经被“中国模式”无情终结,但是西方还在重弹着新自由主义的老调。他们深谙话语之道:“经常不倦地重复自己的论据(改变它们的文字表达形式):重复是影响人民思想的最有效的富有教导意义的手段”^{[8]23}。

2. 哑然:西方左翼的沉寂

2008年的金融危机,在全世界范围内传出了新自由主义的哀乐和葬歌。照理说,新自由主义话语的式微之日,应该是世界左翼大展宏图之时,而左翼政党仍改变不了被边缘化的态势,曾经如火如荼的“占领华尔街”等左翼运动也在悄无声息中草草收场,左翼学派蛰居于学术象牙塔内,创作出疏远现实的遁词。这些遁词“不是通俗易懂的;它在自身内部进行的隐秘活动在普通人看来是一种超出常规的、不切实际的行为;就像一个巫师,煞有介事地念着咒语,谁也不懂得他在念叨什么”^[9]，“只供那些熟知‘思维着的精神’的奥秘的人阅读”^[10]。

3. 对话:中国话语的应然出场

“‘正题’与‘反题’的争论方兴未艾,‘合题’应在中国之路的种种叙述之中”^{[3]23}。中国崛起的崭新故事终结了“历史的终结”话语独白,“中国模式”的中国话语呼之欲出。西方发达国家的危机不仅仅是金融危机,同时也是理念的危机,

更是话语的危机。新自由主义话语的苍白与尴尬,西方左翼学派的沉寂,必然会催生自信的中国话语学派。中国语境下的“中国模式”话语体系在国际社会的关注与国人的殷切期待中应然出场。

(1)实践发展的必然逻辑:精彩故事尚需精彩叙事。中国话语的应然出场是中国实践发展的必然逻辑。鸦片战争以后,为了救亡图存,中国无数的仁人志士,艰难地探索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但都未获得成功,中国故事一度在黯然神伤中收场。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带领人民演绎了美轮美奂的中国故事。精彩故事尚需精彩叙事,中国的知识界如果不对中国故事进行叙述,向世界贡献中国崛起的新理念和智慧,就会愧对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也会辜负“数千年未有之巨变”的大变革时代。“中国模式”都是靠“摸着石头过河”摸出来的,始终坚持实践优先原则,中国的成功就是中国从来没有复制过任何外国模式。“中国模式”也将会在实践中不断拓展、深化和完善,这一过程必将对“中国模式”话语体系的构建产生深刻影响。当中国实践和西方理论发生矛盾时,不是实践迁就理论,“削中国实践之足、适西方理论之履”,而是坚持实践优先,直面实践、认识实践、表述实践,修正理论。中国实践发展永无止境,阐释中国实践永无止境,“中国模式”创新永无止境,构建“中国模式”的话语体系也同样永无止境。“当代中国的理论工作者必须在学习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和学术话语体系,不断提升我国理论和学术的国际话语权”^[11]。

(2)理论演进的必然逻辑:让“中国模式”说中国话。中国话语的应然出场也是“中国模式”话语发展的必然逻辑。“中国模式”的话语具有鲜明的中国逻辑。资产阶级“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2]。鸦片战争以后,面对“亡国灭种”的绝境,面对做“东亚病夫”的奇耻大辱,中国除了被迫接受殖民话语或者主动寻求全盘西化话语,舍此之外别无选

择。当时,不仅中国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国家,考量中国的话语也是典型的殖民话语。列强对中国采用的是典型的双重标准:你可以按照我说的做,但不能按照我做的说。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以俄为师”,引入了苏联话语。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但本本主义(即不加分析教条化地引入马克思主义话语)也使中国革命出现了一些反复,“城市中心论”的话语不适合于中国,必须要创造性地建构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遂有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话语。1938年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13]534}。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再次强调,“必须联系中国的革命实际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话语,进一步提出了“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与我国革命话语相适应的话语^[14]。毛泽东所奠定的革命话语,“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15]。毛泽东对中国的建设话语也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15]。邓小平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炼出了“中国模式”的建设话语:“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16]。江泽民成功将“中国模式”的建设话语推向21世纪,胡锦涛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模式”的建设话语。现在又开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国际化,即“中国模式”建设话语的国际化^{[15]11-12}。

三、话语奠基的尝试:为“中国模式”立言

“文明之间不同的话语体系在打仗”^{[3]140}。话语问题攸关“中国模式”的前途和命运。历史经验表明,理论体系支撑话语体系,话语体系的自洽进一步完善理论体系。“展现中国学派,发出中国声音”已成为国内理论界的共识。中国学界应在厘清“中国模式”的话语逻辑基础上,坚持循序渐进,把握“中国模式”的话语节奏;坚持理论自觉,夯实“中国模式”的话语根基;增强理论自信,提升“中国模式”的话语能量;实现理论自强,建构“中国模式”的话语体系。

1. 循序渐进:把握“中国模式”的话语节奏

以现代性的视角考量“中国模式”,“中国模式”的实质就是现代化的实现问题^①。在“器物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阶段,我们只能亦步亦趋地紧跟欧美话语,毛泽东说:“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先生老是侵略学生”。我们紧跟苏联革命话语,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尝到了苏联建设话语的苦果。在“文化现代化”阶段,毛泽东为“中国模式”立德,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中国模式”立功,到了为“中国模式”立言的时候了。“总结中国模式能够提供新鲜知识,促进我国学界对本土文明的自觉,促进‘中国话语系统’的形成。在这个意义上,归纳中国模式将促进‘中国学派’的崛起”^{[3]6}。“中国模式”是和平崛起的现代性的模式,她为西方殖民现代性的模式提供了可资替代的新的方案。“在国外,中国的崛起已经激起了钦佩、嫉妒、怀疑,甚至在某些角落已经引发了公开的敌意。幸运的是,由于全球化趋势的存在,中国的崛起像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一样,符合所有人的利益。在今后若干年内,在气候变化、全球失衡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等领域,

^①在中国农业现代化向工业现代化转型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要解决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等问题。我们在第一个一百年,解决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问题,即“站起来”的问题;在第二个一百年,我们要解决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问题,即“富起来”和“强起来”的问题。这也就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目前前两步已经走完,正在走向第三步,“三步走战略”的第三步又分化为两小步:第一小步,到建党一百年的时候,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即“富起来”;到建国一百年的时候,基本实现现代化,即“强起来”。

作为重要全球利益攸关方,中国应该而且会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但有一点应该不言自明:互惠互利是必须遵守的原则”^[17]。中国崛起靠的不是对外征服与移民,而是寻求最大的利益共同点,实现包容式发展,共建和谐世界。

“如何在学习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不断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是理论界和学术界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18]。首先,要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为“中国模式”立言。树立问题意识,以解决中国问题为出发点和归宿,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为“中国模式”立言。防止进行概念式的演绎,特别是要坚决摒弃照抄西方学术话语,削中国实践之足以适西方理论之履。其次,应意识到为“中国模式”立言是一个复杂而又长期的过程。为“中国模式”立言是一个创造性的理论工程,不仅要有关于“中国模式”的新术语、新表述,还要有学术观点的创新,更为重要的是要有新理念一以贯之。那些垄断着话语权的国家不会将话语权拱手相送,因为话语权不但与他们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更关乎深层的内在理念。“中国模式”存在着一个解构和重新建构前现代性维度的内在理念,如和平发展理念、科学发展理念、包容性发展理念等。反思和拷问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充满了对外扩张和殖民运动,酿成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悲剧,冷战时期,全球上空笼罩着军备竞赛下的生存威胁阴影,后冷战时期物质至上理念造成的地球资源枯竭的现实危险。“中国模式”仍然处于进行时态,“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15]16}。因而为“中国模式”立言“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

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15]。

2. 理论自觉:夯实“中国模式”的话语根基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模式”的话语根基。理论自觉就是自觉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语境。当今世界,话语权至关重要,谁掌握了国际话语权,谁就占领了意识形态^①的制高点。“讨论任何问题,一定要跳出别人圈出来的框框,包括流行的概念、分析框架、理论体系。尤其是政治问题,在这个领域里流行的概念、分析框架、理论体系都是意识形态的产物,一不小心就会陷入其隐形预设的结论”^[19]。西方语境中关于“中国模式”的总结,有两种乱象值得警惕。一是否认中国奇迹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在西方教科书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讥讽为没有民主制约的非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就是独裁政治,而非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就是意识形态操纵,等等。一句话,“中国模式”只具有经济上的合法性,而没有政治合法性和文化合法性的支撑。二是否认人民主体地位和党的领导是内在一致的,打着“还政于民”的幌子企图消解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模式”的缔造者,也是“中国模式”的中流砥柱。只有把中国共产党想清楚,才有可能把“中国模式”想清楚。“但是,我们的经济学、社会学,包括法学,都在有意无意地把这个问题回避掉,仿佛中国的成就是不需要政治领导和政治决策就能够实现的。也就是说,我们眼前放着一个巨大的掌握着我们国家政治、文化、经济资源,天天在运作的执政集团,可我们的社会科学界却对此视而不见,恰恰要把这个问题回避掉。我觉得,这反映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整个中国学术界存在的问题”^{[3]128}。郑永年也深刻指出,“研究‘中国模式’,核心就是要研究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是中国社会经济整体转型的媒介(agency),是‘中国模式’的塑造者。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和党本身的转型是‘中国模式’紧密相关的两个方面。尽管在谈论‘中

^①新自由主义对“中国模式”的经济方面是认同的,但是对“中国模式”的政治方面却不以为然。叫嚣“中国模式”就是“自由经济”加“一党专政”,“中国只注重发展经济”,“中国用国内民族主义压制民主,中国民主政治改革停滞”,因此“中国模式”构成了对全球现存的和平秩序构成威胁,其隐含的一个重要假设就是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

国模式’时,人们往往强调社会经济发展面,但实际上很难离开党本身的转型来谈论‘中国模式’”^[20]。再者,党的领导和人民主体地位并不存在矛盾。毋庸赘言,中国人民是“中国模式”的主体,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之基和力量之源,离开了人民,就无所谓“中国模式”之说;但是,如果脱离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就不会成为历史的有机的、自觉的主体,中国就会变成一盘散沙,统一的中国又会陷入四分五裂的动荡中。

“中国模式”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产生并不断发展的。“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21]。要改变中国学术界的鸵鸟心态,自觉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语境,努力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着力提高“中国模式”的话语力,自觉坚守马克思主义学术阵地。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模式”提供极具信服力的解释框架。中国共产党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观点作为理论基础的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也是“中国模式”的当代话语。因此,必须实现“中国模式”的话语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体系对接。马克思主义是认识“中国模式”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因为,没有来自中国主流的声音,任由别人评说,久而久之,在这个问题上就会陷入被动。因此无论如何都应当对国外正在热议的中国模式给予正面的回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模式给予科学解读,构建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22]。

3. 理论自信:提升“中国模式”的话语能量

提升“中国模式”的话语能量,牢牢掌握“中国模式”的话语权,理论自信不可或缺。“我们党是一个由科学理论孕育催生、用科学理论武装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是党的鲜明特征和根本优势。九十多年的历史实践充分表明,我们党正是靠着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夺取革命、建设、改革的

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实现了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18]。

对“中国模式”的研究不能只局限于中国内部,以前我们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在建设和改革上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为了进一步巩固建设和改革的成果,今后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侧重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化,增强话语能量,这也是总结“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之所在。

要正视国际话语权格局中的西强我弱格局,但更要看到欧美国家继续维护话语霸权存在一系列的制约因素,看到我们自己的话语优势,以提高我们的理论自信。首先是国际政治格局的制约,新兴国家尤其是金砖四国都竭力反对话语霸权,并努力建构自己的话语。其次,欧美话语霸权饱受诟病,那些接受欧美话语霸权的国家,都深陷泥淖,如债务危机的陷阱、颜色革命的震荡等。再次,西方国家在全球治理问题上已经显得力不从心。如贫困问题、恐怖主义问题、宗教冲突问题、生态问题……所有这些都使得西方话语陷入窘境。西方世界在这些方面手足无措,不得不求助于新兴国家,G7国治理让位于G20国治理就是一个明证。在这样的一种情势之下,中国话语为解决全球问题带来一线曙光:“和而不同”可以解决“文明的冲突”的问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解决民主输出问题;“民胞物与,天人合一”可以解决生态问题。总之,中国话语正在步入佳境,我们对中国话语充满自信。我们的一些人“言必称欧美”,其思想深处还是贾贵式的奴才思想在作祟。“帝国主义者长期以来散布他们是文明的、高尚的、卫生的。这一点在世界上还有影响,比如存在一种奴隶思想。我们也当过帝国主义的奴隶,当长久了,精神就受影响”^[23]。

中国的话语自信是有着深厚的根基的。中国的话语自信源自中国已经取得了“三大成就”: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话语自信源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历史成果,“伴随着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我们已经初步

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自信”^[24]。中国的话语自信源自中国已经完成了“三件大事”,即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的话语自信也源自对中国国情的正确认识。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十八大向全党和全世界昭告: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中国模式”话语的自信,使得我们能够有效抵制来自“左”和右的各种干扰,既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也不为任何干扰所惑。

4. 理论自强:建构“中国模式”的话语体系

建构“中国模式”的话语体系,除了“中国模式”的话语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体系对接外,还要扬弃西方话语,批判改造中国传统话语。

(1)文明之间的对话:借助西方话语资源。在现代,衡量一个国家发展进步的根本标准往往就是其西方化的能力与程度。当前,我们不得不正视世界话语格局中“西强我弱”局面:尽管我国对西方国家在贸易上保持了连续多年的双顺差,但我们在学术话语上建设却是逆差,学术创新严重滞后。一个没有自己理论话语的民族,注定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中国模式”不能充当新自由主义的留声机。“实际上,中国的很多东西都是混合的,都在似与不似之间。这是中国很奇妙的地方,套用西方的概念不行,逼着我们要讲自己的话,讲中国特色的话”^{[3]83}。“西方作为霸权的一方一直企图用强制手段主宰其他地方,而其他地方又通过劳工、资本、人才和宗教等多方面的迁徙移动而全面渗透西方。现在是时候了,各种文明之间该本着相互依存的精神开展对话了”^[25]。

“中国模式”所构建的话语体系,应该既能为我所用,又能被世界所认可。故而,要在尊重中国话语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借鉴西方话语资源,实现西方话语的中国化。“从一种策略性话语真正转变为一种主体性话语,从理论议题的应对模式转变为自主建构模式,转变为具有中国内涵的

概念生成和思想创造体系,已构成当代中国学术的核心议题”^[26]。让“中国模式”说中国话,既要以为我为主,又不能固步自封。“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发展、对于国际问题的认知,应该在汲取世界智慧的同时,善于用自己的价值观加以评判,用自己的话语加以表述。对于西方话语,我们应该变‘仰视’为‘平视’,敢于进行平等的对话,敢于直面现实问题,理直气壮地通过讲道理、摆事实,从两种制度、两条道路的对比中说明自己的优越性。只有这样,才能改变步西方话语后尘的状况,打破西方话语的垄断”^[27]。首先,要夺取话语权,将反映人类文明成果的话语大胆地采取“拿来主义”,把这些话语写在“中国模式”的旗帜上,内化到我们的话语体系当中。“我们必须树立一个明确认识,不管是哪种社会制度下创造的文明成果,只要是进步的优秀的东西,都应积极学习和运用”^[28]。如“自由”、“平等”和“博爱”等政治话语权,它们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拒斥这些话语,恩格斯指出,“自由、平等和博爱。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地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社会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29]。党的十八大的报告中,“自由”、“平等”已经被列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次,要旗帜鲜明地颠覆西方的话语霸权。有些话语如“人权高于主权”就要果断地放弃,这一话语即使在西方世界也是声名狼藉,我们中的有些人却奉为圭臬。最后,批判地改造西方话语,为我所用。如我们将“北京共识”转化为“中国模式”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我们的考量是:一是因为“北京共识”是一个霸权性的语言,不利于中国的外交事业。二是共识用得太多、太滥,以致“耶鲁全球化”网站有篇文章讽刺道:“如果你想要你的思想非常有市场,那就贴上‘共识’的标签,这表明它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系统的理论”。三是根本就没有形成什么共识。又如“软实力”一词,我们赋予了其全新的中国内涵。约瑟夫·奈最初提出软实力概念,其动机就是为美国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服务的。而我们用它则是为建设和谐世界、和谐社会服务

的。

(2) 视阈的融合：批判改造传统话语。建构“中国模式”话语体系还要批判改造传统话语，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批判改造中国传统话语，并赋予其以新的时代内涵，以实现古今视阈的融合。“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3]533}。如毛泽东所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提出的“小康社会”这一奋斗目标，江泽民提炼的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胡锦涛所提炼的“求真务实”的工作方法，都是对中国传统话语予以改造的典范。中国的学术界也提出了“以仁对等人权、以义对等自由、以民对等民主”^{[3]349}等话语，也是深入挖掘中国理念的结果，可以作为构建“中国模式”的话语。支撑“中国模式”的理念，如“和谐世界”、“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具有一定的普适性，易于为全世界所接受，不失为“中国模式”话语的重要内容。因为这些理念深受广大发展中国家青睐，发达国家也易于接受。中国要善于运用这些理念，凝练为富有感染力的时代话语，作为塑造中国良好国际形象的着力点。

(3) 中国立场与国际视野：“中国模式”话语建构的策略选择。“中国模式”是一个开放的话题，常说常新，决定了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解读，但不存在不偏不倚的学术立场，任何学术思潮隐含着一定的政治预设，西方自诩其学术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是公正的化身，乃是一种抽象的谎言。研读“中国模式”第一位的是要坚持中国立场。

坚持中国立场，就是要抓住全球治理的契机，展示“中国模式”的话语优势。现在的中国很难再韬光养晦下去，中国要在全球治理中，抢占话语权高地，建立自己的话语权。我们要履行与我国国力相称的职责，并将此巧妙地转化为话语优势，推动国际话语权向中国转移。运用中国智慧，着力推进“中国模式”话语的国际化。如“小

康社会”这个话语，我们把它译为 Well-off society，在国际和国内都广受好评。坚持中国立场，百姓认同“中国模式”是关键。“只有首先赢得中国人民的喜爱，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才能堂堂正正地走向世界和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30]。“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31]。因而在“中国模式”大众化过程中，彰显“中国模式”的话语优势。邓小平同志是“中国模式”大众化的典范，如著名的“猫论”和“摸论”，深入浅出且形象、生动。推进“中国模式”大众化是中国知识界义不容辞的职责。中国知识界要抵制住西方话语的诱惑，善于将政治话语转化为生活话语。“在建立自己统治地位上发展着的每一集团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它为同化和‘意识形态’上战胜传统知识界而斗争，——这个集团同时形成自己有机的知识界越有力，则同化与战胜的完成更加迅速，也更加有效”^{[8]423}。

研读“中国模式”还要有宽广的国际视野，要善于在国际比较中凸显“中国模式”的话语优势。“中国模式”带来的效应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最能够感同身受的。从古巴到越南，从印度到巴西，“中国模式”话语吸引力愈发彰显。“中国模式”的绩效合法性比西方模式的程序合法性更具话语优势，“中国模式”的家国同构比社会学上国家与社会的两分更具话语优势、“中国模式”的良政与恶政两分比民主与专制的两分更具话语优势，“中国模式”的“渐进式改革”比“苏联模式”的“休克疗法”更具话语优势。

四、结 论

话语也是一种权利，而且是一种重要的权利。一个国家的话语权是该国综合国力的反映。用什么话语表述“中国模式”反映的是深层的思想问题。中国已经进入世界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到了中国为世界理论做贡献的时刻了。

讲好“中国故事”，为整个世界贡献出与我国硬实力相对称的理论成果，这不仅关乎中国的未来，对世界也至关重要。欲讲写好“中国故事”，展示出“中国模式”的价值及其世界意蕴，必须要提炼出独具特色的“中国话语”。

没有“中国模式”的理论,就没有“中国模式”的实践。建构“中国模式”的话语体系任重道远。理论自觉是话语的根基,理论自信是话语的关键,理论自强是话语的归宿。“中国模式”的最大价值就是人类道路发展应该而且可以多样化。把“中国模式”的当代价值意蕴展示出来,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大发展点。

世界在聚焦“中国奇迹”,中国在总结“中国模式”。过去,是西方出题,我们答题,西方出上

联,我们对下联。现在,西方话语幽灵依旧徘徊在中国上空,中国的话语依然还很弱势,只是在强势的西方话语面前发出的一些微弱的回声。我们尚不能全景式地图解“中国模式”,但我们已经提炼出了一些关键词,如中国崛起、中国道路、中国体系、中国经验,中国特色,等等不一而足。目前的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是一种对国外研究的被动回应,将来要主动回击。“中国模式”的话语建构必将重新书写全球话语格局。

参 考 文 献

-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89-290.
- [2]张师伟.西方话语输入与“中国模式”的建构:“中国模式”建构的话语背景[J].文史哲,2012(5):153-159.
- [3]潘维,玛雅.人民共和国六十周年与中国模式[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 [4]任仲平.转变,中国道路的历史性跨越:从十六大到十八大:上[N].人民日报,2012-11-06(2).
- [5]轩传树.从“外来”到“内化”:对西方“中国模式”之争的一种解读[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5):138-144.
- [6]郑杭生,黄家亮.“中国故事”期待学术话语支撑:以中国社会学为例[J].人民论坛,2012(4下):59-61.
- [7]郑永年.通往大国之路:中国与世界秩序的重塑[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141.
- [8](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9.
-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0.
- [11]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增强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 用中国话语体系解读中国道路[J].求是,2012(14):23-26.
-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6.
- [1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 [1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44.
- [15]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N].人民日报,2012-11-18(1).
- [1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1.
- [17]余永定.中国已到紧要关头[M]//谢平,管涛.反思中国模式.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45.
- [18]李长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2-06-02(2).
- [19]王绍光.理论自觉自信自强:路径与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构理论研讨会[J].人民论坛,2012(8):.
- [20]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M].杭州:浙江出版联合集团,2010:58.
- [2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16.
- [22]肖贵清.论中国模式研究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2(1):5-12.
- [23]中央文献研究中心.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82.
- [24]张国祚.中国话语体系应如何打造[N].人民日报,2012-07-11(2).
- [25]杜维明.多种现代性:东亚现代性涵义初步探讨[M]//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323.
- [26]万俊人.大家论道:用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诠释中国现代性[N].人民日报,2012-09-07(3).
- [27]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增强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 用中国话语体系解读中国道路[J].求是,2012(14):4-6.
- [28]中央文献研究中心.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068.
- [2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9.
- [30]中央文献研究中心.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152.
- [3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9.